

■ 教育与经济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2.05.009

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差距缩小了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吗



张冰冰,姚聪莉,宁一静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069)

摘要:阶层合理有序流动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以子代职业收入为指代,在将城乡差距纳入传统代际流动分析框架后,基于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总体并分年代评估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并未缩小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一方面,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不均等;另一方面,成长环境的累积效应拉大了优质高等教育结果的城乡差距。由此,弱势家庭子女面临代际绝对收入上升而代内相对收入下降的风险,实现共同富裕需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点,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以缩小群体发展能力差距为核心。

关键词:城乡差距;子代职业收入;高校质量;共同富裕;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2)05007914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条“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1]。邓小平在1990年12月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明确提出“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

修回日期:20220408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内涵式发展背景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策略及就业效应研究”(19JK0819)

作者简介:张冰冰,男,河南平顶山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姚聪莉,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宁一静,女,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公共教育政策研究。

引用格式:张冰冰,姚聪莉,宁一静.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差距缩小了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吗[J].重庆高教研究,2022,10(5):7992.

Citation format:ZHANG Bingbing, YAO Congli, Ning Yijing. Does the urban-rural gap narrow the offspring's occupational earnings differ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2, 10(5): 7992.

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进一步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指明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总的思路和目标方向^[4]。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不懈追求的目标,现在正处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妥善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二是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说,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和关键途径,平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和主要表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有助于构建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可加速形成区域平衡协调的发展格局,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目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上,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必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5]。

那么,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如何?这一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但至关重要。一方面,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教育代际传递^[6]、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7]和内在机制^[8]等方面,多将城乡差距作为代际流动的外生宏观背景,鲜有研究将其作为内生性因素来考虑。时至今日,我国底层上升渠道存在日益狭窄的趋势^[9],在改革开放后城乡、城市之间分化明显^[10]。本研究关注在我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背景下,作为一系列制度和约束产物的城乡差距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只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后实现良好就业,才算真正实现地位提升^[11],阶层之间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从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12]转向有效限度维持不平等^[13],也就是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得以缩小,但优势阶层开始重视对教育质量的争夺,因此有必要关注此阶段高校质量在上述影响机制的中介传导效应。相关结论可为通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证据,更能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指引。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个体代际流动的概率取决于本人及其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等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以及不同资本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和代际传承的能力^[14]。父代的社会资源占有优势可传递并转化为子代的资本优势,这类先赋性因素增加了代际阶层再生产,而本人的教育获得和努力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则有助于其完成代内的阶层跃迁。为保持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在提升后致性因素作用的同时,需降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这是未来社会公平治理的重要政策走向。

(一)传统的代际流动分析框架

传统分析框架多是围绕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教育选择与子女职业收入而展开,具体如下:

一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直接转换为子女职业收入优势。有研究指出,代际流动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影响要高于教育的作用^[7]。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需要以一定的“关系和背景”为基础,父亲的管理职位越高,子代教育回报的边际效应越大^[15]。对底层家庭子女而言,信息支持和求职效率都较低,其本人与家庭都缺少有效的社会资本^[16],求职更多依靠公共渠道,而非亲朋好友等私人途径^[17],也难以承受过高的求职费用,这直接影响就业结果并减少职业收入。

二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转换为子代教育优势,并间接影响子代职业收入。多数实证研究表

明,教育机会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家庭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主要传承空间,子女通过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辈的文化资本^[18],这种家庭文化惯习营造了有利的学习生活环境^[19],特别是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非认知能力也越高^[20],通过教育行为、情绪行为、家庭关系和孩子阅读等途径可有效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和升学概率。其次,子女教育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极为重要^[21],可有效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22-23],最终表现为子女接受基础教育^[24]、高等教育^[25]的质量差距和未来工资收益差异^[26],例如优势阶层通过“补习班”和各类竞赛项目等途径更容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再次,优势阶层子女能获得更多来自家庭的学业和信息支持^[27],既包括与学校学习生活相关的各种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也包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有价值的非正式信息(hot knowledge)^[28],使其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具有更为卓越的学业表现和更高的升学率。最后,家庭背景也可通过其他非正式方式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如父母的政治资本和职业类型对子女教育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9]。在此背景下,教育机会不均等必然会加大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特别是毕业于省级重点高中的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收入要比同辈高约17%^[30],甚至通过工作转换、努力程度等因素,大学教育质量会为个体带来约28.45%的边际报酬^[31]。

可以说,社会流动性的高低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强弱,教育获得在阶层流动与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教育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基础性、持久性和引领性作用^[32],其对底层家庭子女阶层流动的贡献为6%~18%^[17]。

(二)考虑城乡差距后的代际流动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公共资源分布极为不均衡,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从农村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集聚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优势阶层通过“户口迁徙”“学区房”“高考移民”等方式选择子女成长地。相关研究也表明,城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3.26%^[33]，“985工程”高校中大城市学生的辈出率稳步提升,而县级及以下学生的辈出不断降低^[34]。为此,优势家庭拥有更强的迁移能力与意愿,往往通过“用脚投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以保持其子女教育优势最大化,故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存在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即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获得高水平职业收入的概率也随之越高。

以往研究指出,相同教育水平下城市子代获取高收入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子代^[35-36],并将其归结于原生家庭的教育分化。本研究认为上述差异还源于子代外部成长环境的差异,其内在逻辑是,通过自我管理能力、应变能力等非认知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的分化使子代在成长中自然地构建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能力素质,赋予了其独特的群体特质^[37],这种差异将持续存在并影响终身。由此,城乡身份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集中表现,抑或是文化资本的差异^[38]代表着一种社会分层方式,以及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定与发展期望。这种无形的藩篱因户籍制度而正式化,一度成为社会流动的身份壁垒,而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农转非”则是农民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39]。为此,鉴于子代成长环境是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联结所在,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存在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即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更可能拥有较好的外部成长环境,获得高水平职业收入的概率也随之越高。

我国社会流动机制转向市场化主导和社会分层结构趋于稳定的时间节点大约是2000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内(1998年前),我国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等外延性因素,出现大幅度的代内跨越式流动且规模较大^[40],但1998年后社会流动中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等市场化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趋于稳定,代内跨越式流动的概率大幅下降且规模相对缩小^[41]。

这一观点得到了主流社会学派的认可。如李强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分层动力逐渐从以政治分层为主导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导,且社会分层结构趋于稳定^[42]。张顺同样作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出稳定态势的论断^[43]。同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82年的20.90%上升到2000年的36.09%,继而达到2020年的63.89%,即2000年后城镇化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集聚性特征得以强化,城乡、城市之间在价值观、行为规范、消费休闲、信息处理等方面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亚文化,社会生活、职业选择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明显。为此,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的效应与机制必然随着我国社会流动的动力转换、社会结构的区域稳定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宏观变化而呈现出年代效应,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存在年代异质效应,即2000年后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要强于2000年前。

假设3.1: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在2000年后更强。

假设3.2: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在2000年后更强。

为此,考虑到城乡差距既代表着制度安排下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又暗含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应当纳入传统代际流动分析框架(如图1)。具体来说,城乡差距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选择和职业收入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优势阶层拥有较强的迁移能力与意愿,充分利用教育资源集聚特性,“用脚投票”为其子代谋求教育优势的最大化(假设3.1),并借助成长环境累积效应,获得子女综合素质能力的竞争优势(假设3.2)。上述模型的建构有助于揭示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内在机制,并评估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可能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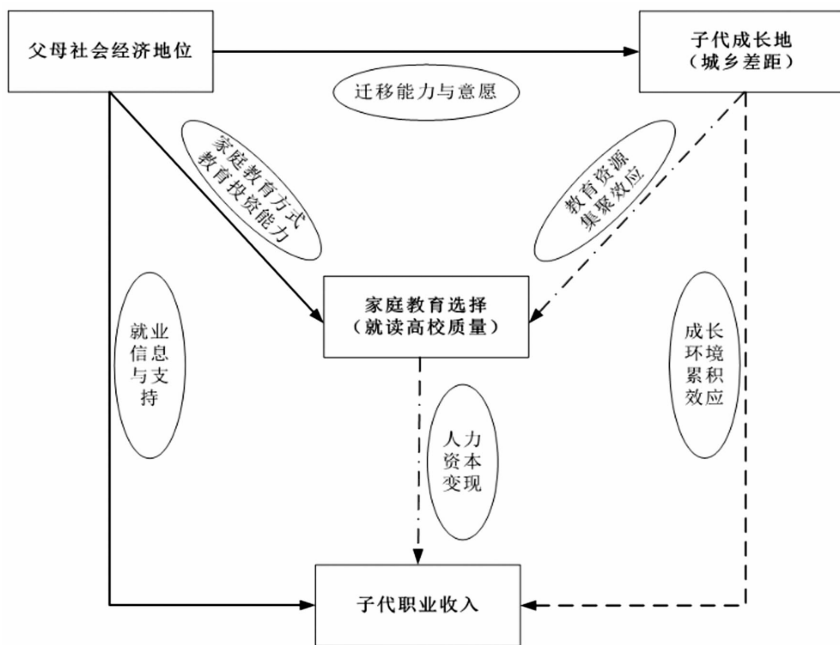


图1 纳入城乡差距因素后的代际流动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2019年陕西省劳动力社会性流动调查”,基于人口规模、人均GDP加权后从

陕西 107 个行政区^①中随机选取 10 个行政区,调查涵盖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发展和感知社会感知等内容,共发放 32 500 份问卷,有效回收 28 468 份。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群体,不包括自雇、雇主、务农、兼职等群体;考虑到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 60 周岁和 55 周岁,将样本年龄限制在 16 周岁到 60 周岁;依据 2019 年最低工资规定和异常值分布,将年工资收入限制在 2 万元到 100 万元之间,最终有效样本 4 432 人。

(二)变量说明

职业收入既是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等综合配置的结果,也是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在兼顾样本分布和模型解释便利后,将子代职业年收入的取对数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主要有 3 类:一是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 14 岁时父母的职业类型^②、政治面貌和教育水平。二是城乡差距,因经济发展、资源集聚等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本研究使用子代 14 岁成长所在地来界定城乡之间和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包括农村、乡镇、县城或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5 类。三是就读高校的教育质量,按照成人专科、普通专科、成人本科、普通本科、“211 工程”高校本科、“985 工程”高校或境外高校等层次类型进行转换。

同时,将样本的出生年份 1980 年作为年代效应的分组依据,评估 2000 年前后两代人的代际流动的差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教育大规模扩招是 1980 年及之后出生群体才能享有的政策红利,从 1980 年到 1999 年我国基础教育毛入学率从 93.0% 上升到 99.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从 24.6% 上升到 63.8%,从 1999 年开始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另一方面,1980 年及之后出生群体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和城乡分化的日益加剧,其从小就受到改革开放新思潮的熏陶,且 1980 年后的婴儿潮使其在就业制度改革中面临更为激烈的同辈竞争,该群体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独特的社会性格特征,这持续影响着其社会流动。为此,上述出生群组较好地契合了已有研究对 2000 年前后社会流动机制发生明显变化的结论,可以作为评估 2000 年前后城乡差距对子代收入差异异质性影响的分组依据。变量及其分布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及其分布特征汇总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虚拟变量)	1 854	0.42	0.49	0	1
1980 年前出生群体(虚拟变量)	1 588	0.36	0.48	0	1
年龄	4 432	37.72	6.36	18	60
子代职业年收入	4 432	5.97	8.83	2	100
子代职业年对数收入	4 432	1.56	0.53	0.69	4.61
就读高校质量					
成人专科	953	0.14	0.34	0	1
普通专科	642	0.09	0.29	0	1
成人本科	1 556	0.22	0.42	0	1
普通本科	1 035	0.15	0.36	0	1
211 本科	186	0.03	0.16	0	1
985/海外本科	60	0.01	0.09	0	1

① 行政区划分参考《陕西省统计年鉴(2019)》的分类标准,即以各县(市、区)为行政区的基本单元。

② 本研究将被调查者的职业划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职业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含教师、医生等);第二类职业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军人;第三类职业为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民工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续表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差距 (子代成长地)	农村	2 869	0.65	0.48	0	1
	乡镇	327	0.07	0.26	0	1
	县城/县级市	848	0.19	0.39	0	1
	地级市	173	0.04	0.19	0	1
	省会城市/直辖市	215	0.05	0.21	0	1
父亲职业类型	第一类	1 067	0.24	0.43	0	1
	第二类	1 406	0.32	0.47	0	1
	第三类	1 959	0.44	0.50	0	1
母亲职业类型	第一类	404	0.09	0.29	0	1
	第二类	1 458	0.33	0.47	0	1
	第三类	2 570	0.58	0.49	0	1
父亲受教育年限		4 432	9.23	3.52	0	23
母亲受教育年限		4 432	7.48	4.05	0	23
父亲加入政党		4 432	0.34	0.47	0	1
母亲加入政党		4 432	0.07	0.26	0	1

(三) 模型识别

以往研究对收入差异的探讨多基于明瑟教育收益率方程及其修正模型展开,但并不适合于本研究的分析需要。一方面,本研究侧重剖析父母社会经济背景、城乡差距、教育选择和收入差异之间的影响机制,而非简单地探讨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采用传统估计方法,需面临若干估计偏差。具体包括:一是以职业收入为因变量,存在劳动力市场进入选择偏差和雇员身份选择偏差;二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若干指标之间存在共线性,例如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等存在婚姻偏好内生的可能;三是收入估计中往往存在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差,例如能力变量。上述问题并非不能一一解决,但在单一模型中同时解决上述问题极为困难,否则难以估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

与传统模型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结构方程模型适用于变量多、结构复杂的模型,如容许单一指标从属于多个因子;二是结构方程模型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包含一定的测量误差,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问卷调查法的弊端;三是结构方程模型同时估计了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特别适用于对影响机制估计;四是可弥补共线性问题,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计算出某一变量的间接效应,而这是传统估计方法无法实现的;五是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可准确获得变量间的因果系数。考虑到本研究对机制分析的需要,以及变量之间的关联极为复杂,特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计量工具,采用 AMOS 23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

三、计量结果

(一) 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总体效应

在不影响理论完整性的前提下,本研究结合模型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 MI)增加了部分残差的共变关系,以提高调研数据与理论模型的契合度,所采用的 GLS 估计更适用于大样本,且对数据

正态性不做严格要求,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①。总体上,父亲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力要高于母亲,其中以职业地位为指标的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以加入政党为指标的政治资本,最后是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的文化资本。

如表2所示,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95,说明教育仍是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后致因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优质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并不明显。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62,意味着优势阶层仍可将家庭资本优势传递并转化为子代职业收入优势,即先赋性因素在阶层流动中仍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城乡差异并不显著,即假设1并未得到验证。然而,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64,这意味着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借助城乡分化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间接助力子代获得收入优势,即假设2得到验证。

表2 以高校质量为中介的总体效应和年代效应(标准化系数)

		总体估计	分年代估计		
			2000年以前	2000年及以后	差异临界比值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	总效应	0.102***	0.121***	0.110***	-
	直接效应	0.062***	0.100***	0.054**	1.048
	间接效应 ^①	0.040***	0.021	0.056**	-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	总效应	0.038**	0.049*	0.151***	-
	直接效应	0.036	0.097**	0.159***	-1.281
	间接效应 ^②	0.002	-0.048***	-0.007	-
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	总效应	0.064***	0.024	0.087***	-
	直接效应	0.064***	0.034	0.088***	-1.569
	间接效应 ^③	0.000	-0.011***	-0.002	-
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	直接效应	0.095***	0.106***	0.100***	-0.046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	直接效应	0.565***	0.469***	0.460***	0.441
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	直接效应	0.004	-0.102***	-0.016	-2.338***

注:(1)显著性为Bootstrap 500次后经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后所得,**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2)差异临界比值仅限于直接效应的分群组估计的显著性检验。(3)表中左侧第一列为理论模型(如图1)的原始影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①表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子代职业收入之间以高校质量和子代成长地为中介的3条影响路径系数之和,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间接效应^②表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高校质量之间以子代成长地为中介的影响路径系数,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间接效应^③表示子代成长地和子代职业收入之间以高校质量为中介的影响路径系数,即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

① 在绝对适配度方面,理论模型卡方值为16.586, p 值为0.121,理论模型未被拒绝; GFI 指数为0.999, $AGFI$ 指数为0.997,都远高于0.9的标准; RMR 值为0.014, $SRMR$ 值为0.009, $RMSEA$ 值为0.011,均小于0.05的标准; NCP 值为5.586,90%的置信区间[0.000,20.683]中包含0值;理论模型、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的 $ECVI$ 值分别为0.019、0.020和1.074,理论模型的值小于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在增值适配度方面, NFI 值、 RFI 值、 IFI 值、 TLI 值和 CFI 值分别为0.997、0.989、0.999、0.996和0.999,均高于0.9的标准。在简约适配度方面, $PCFI$ 值和 $PNFI$ 值分别为0.305和0.304,未达到高于0.5的标准; CN 值为5257,高于200的标准; NC 值为1.508,介于1和3之间;理论模型的 AIC 和 $CAIC$ 值均低于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AIC :84.586、90.000、4757.693; $CAIC$:336.071、422.847、4824.262)。

综合来看,高校质量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贡献率仅有3.36%,同时教育资源集聚效应也不显著,贡献率仅为0.21%,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并不明显,教育依然是有效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后致因素。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职业收入直接效应的总体贡献率为60.91%,城乡差距的调节路径强度为0.034,总体贡献率为35.52%,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可直接转化为子代的职业收入优势,先赋性因素对代际阶层再生产的作用依然明显,而城乡分化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更加强化了这种优势的代际传递。可以说,城乡分化已然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即使接受相同质量的高等教育,底层家庭出身子女依旧很难实现阶层跃迁。

(二)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年代效应

考虑到宏观社会变革带来的异质影响,本研究评估对比了2000年前后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效应与机制的年代差异。总体上,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良好^①,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仍大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作用强度在2000年前后从1.31上升到1.44,而后的作用强度则分别从0.89下降到0.86和从0.85下降到0.75,这与宏观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密不可分。

如表2所示,在子代职业收入的直接影响路径中,高校质量的作用强度在2000年前后都是最高的,但以子代成长地为指代的城乡差距的作用在2000年后反超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第二重要因素。具体来看,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在2000年前后都比较显著,从0.106下降为0.100,但差异并不显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在2000年前后都比较显著,从0.097增加到0.159,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正逐渐显现。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从2000年前的显著(-0.102)上升为2000年后的不显著(-0.016),表明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农家子弟就读高质量大学的优势不再,城乡分化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得到了加强,这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即假设3.1得到验证。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强度从2000年前的0.100下降到2000年后的0.054,且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从2000年前的不显著0.034上升到2000年后的显著0.088。上述路径的系数变化并不显著,说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效应正逐渐下降,而以成长环境积累效应为媒介的间接路径正得到强化,即假设3.2得到验证。

综合来看,如图2所示对比不同路径的总体贡献率后可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贡献率从2000年前的82.54%下降到2000年后的49.25%,成长环境累积对上述路径的调节效应的贡献率从13.16%上升到36.92%。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贡献率从8.49%上升到14.5%,教育资源集聚对上述路径调节作用的贡献率从-4.19%上升到-0.67%。为此,2000年后我国社会的公平性有所提升,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职业收入的直接影响逐渐下降,但潜伏着阶层固化的风险,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借助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这一合理的制度因素正逐

^① 在绝对适配度方面,理论模型卡方值为36.605, p 值为0.128,理论模型未被拒绝; GFI 指数为0.998, $AGFI$ 指数为0.994,都远高于0.9的标准; RMR 值为0.021, $SRMR$ 值为0.009, $RMSEA$ 值为0.008,均小于0.05的标准; NCP 值为8.605,90%的置信区间[0.000,28.402]中包含0值;理论模型、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的 $ECVI$ 值分别为0.036、0.041和0.11,理论模型的值小于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在增值适配度方面, NFI 值、 RFI 值、 IFI 值、 TLI 值和 CFI 值分别为0.984、0.958、0.996、0.990和0.996,均高于0.9的标准。在简约适配度方面, $PCFI$ 值和 $PNFI$ 值分别为0.387和0.383,未达到高于0.5的标准; CN 值为5.004,高于200的标准; NC 值为1.307,介于1和3之间;理论模型的 AIC 值均低于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AIC :160.605、180.000、2264.117)。

渐“隐性合法化”地完成阶层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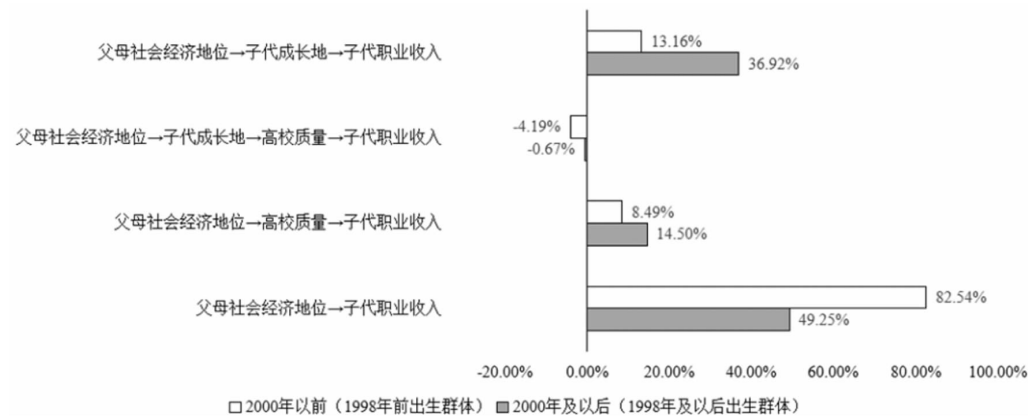


图2 2000年前后子代职业收入影响路径的贡献率对比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为:一是将城乡差距纳入代际流动的传统分析框架中,评估了城乡差距在代际流动中的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和成长环境累积效应;二是以出生时间1980年为节点,评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2000年前后代际流动机制的变化;三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避免了传统估计因共线性产生的估计偏差,提高了估计准确性。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调研数据仍无法做到完全随机,且调研范围受限,难以覆盖全国。考虑到陕西虽地处我国西部地区,但在城乡与城市之间的分化、家庭教育选择、代际收入传递和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与我国社会总体状况差异并不大,本研究可反映其共性特征,故尽管样本受限,但结论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研究未完全解决部分能力变量缺失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研究对象局限于受雇者带来的选择性偏差。

总体上,尽管我国自1949年始就将共同富裕列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过去侧重效率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城乡分化,并未缩小甚至进一步拉大了子代之间的职业收入差距。尽管我国的社会公平性在2000年后有所提升,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职业收入的直接影响明显降低,但城乡分化开始成为阶层复制与再生产的“合法”渠道。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城乡分化的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均等,扩大了子代职业收入差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优质高等教育短缺且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44]。本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仍是提高子代职业收入的重要因素,“读书改变命运”在当下依然有效,但这种作用正在逐渐减退。特别是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发生了显著变化,意味着子代成长地和高校质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已然消失,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开始向大城市出身群体倾斜,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再到大学阶段是优势累积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和城市之间教育资源分化严重,形成了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二元结构,即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中,中小学阶段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方面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鲜明的分层,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45]。这种制度性的双重藩篱使农村学生群体长期处于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既无法使其获得足够多的重点学校入学机会,更无法保障优质高等

教育的机会均衡。甚至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首先满足的是城市重点高中生,使他们更有机会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这并不能直接解决农村非重点高中生的“双重二元结构”不平等^[46]。显而易见,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对社会分层与教育的良性互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强化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异,形成了从省会城市/直辖市到农村的差序格局,并将这种不均等进一步扩大至子代之间的职业收入差异中,使农村弱势群体即便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却无缘一跃过“龙门”。

二是城乡分化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拉大了优质高等教育结果的城乡差距,扩大了子代职业收入差异。早期研究将教育“回报过度”,即相同教育背景下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育的收益率越高^[47],归结于家庭对子代的就业信息支持和搜寻成本补偿力度更大^[48]。本研究验证了上述发现并为其提供了另一解释,即教育“回报过度”还由城乡分化下的外部成长环境差异所导致,这使子代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习性并延续至职业生涯,该机制的贡献率在2000年后超过了30%。刘易斯认为,一旦贫困文化形成便持续永存,贫困子女六岁或七岁之后会逐渐吸收其所属亚文化群体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这使他们并未意识到要充分利用可促进其终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提升机会^[49],这是成长环境累积效应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受限于成长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弱势家庭及其子女缺乏培养兴趣与爱好的环境、意识与能力,并在城乡分化格局中形成截然不同的亚文化,携带着譬如缺乏社会交际能力、自信心、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等文化烙印。多数研究指出,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在社团参与比例^[50]、参与社会实践与担任班干部^[51]、担任校级干部与获奖情况^[52]等方面经历匮乏,这是上述文化劣势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且难以被高等教育经历所弥补。换言之,在拥有相同教育经历的群体中,囿于缺乏精英环境所认可的“文化技能”,以及愈加强调综合素质的就业环境中,弱势家庭子女在初职获得概率和未来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劣势。为此,城乡分化下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结果的城乡差异,使农村和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子代即使接受了相同的优质高等教育,依旧难以“超越”其他同辈。

三是城乡分化格局下弱势家庭子女面临代际绝对收入上升但代内相对收入下降的风险。相对贫困的本质是贫困人口难以借助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发展能力和经济能力^[53]。本研究表明,即便就读相同层次的大学,农村和贫困大学生往往拥有更低的教育收益率。有研究指出,在我国的“985工程”重点大学内,能力筛选机制而非文化再生产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在普通本科院校中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拼”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54]。然而,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使绝大多数弱势群体无缘这种脱离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成长环境,而对进入到普通本科院校的低收入群体子女而言,其仍缺失充分利用现代教育等途径改善自身贫困现状的能力和途径,依旧面临着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境^[55]。由此,在城乡分化背景下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和成长环境累积效应使弱势家庭子代相较于父代表现出绝对收入有所提升,但相较于其同辈表现出相对收入不变甚至减少的困境,这无益于底层家庭出身子女的社会阶层跃迁。长此以往,预期收益的下降和就业风险的上升会进一步降低弱势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其子女将被迫选择“高考弃考”或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56]。更有甚者,部分弱势家庭在没有更好选择时,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投资意愿,但较低的职业收入在增加农村大学生升学压力和家庭教育成本的同时,又增加了负债读大学致贫的风险^[57],形成了贫困的代际循环。

(二)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全面富裕,是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源性动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高度综合协调状态。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实

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做大做优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其中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人群,而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等弱势家庭出身的高校毕业生更是联结当下低收入群体和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有生力量,借助高等教育实现阶层代际流动可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上述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系统性的社会治理政策,基于本研究结论并围绕高等教育的功能,我们提出以下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一是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点,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物质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在推动创新引领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具备先天优势。一方面,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创业深度融合,聚焦基础研究和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通过知识创新、技术突破和人才培育等途径,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另一方面,加快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专业结构优化、学科布局调整和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为区域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创新引领和治理支持,推动要素资源在城乡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和合理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总之,创新驱动发展是“做大”蛋糕的内生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是“分好”蛋糕的宏观前提,二者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又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发展基础。

二是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筑牢共同富裕的民生根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针对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在城乡之间存在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又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更是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理念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教育公平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应构建自下而上的教育公平政策体系。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前提下,加速实现省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进省域内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扎实推进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的定向招生计划,提高重点高校录取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学生比例。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的受教育权利,着力推进控辍保学精准化制度化,有效降低辍学率。另一方面,充足、均衡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人民精神富足的重要表现,既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丰富数字文化产品供给,围绕终身学习教育和学习型社会探索公共文化和教育等的深入融合发展,又要推动省域内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建立省、市、县三级公共文化供给体系和统一标准,加大乡镇公共文化设施配套建设力度,推动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发展。应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广泛吸收优质社会资源参与到公共就业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健全劳动权益保护机制,保障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利,消除一切就业歧视。

三是以缩小群体发展能力差距为核心,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共同富裕是动态的逐步共富,需妥善解决“能力—收入—财富”的代际循环马太效应。一方面,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财富差距的缩小。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调整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另一方

面,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能力差距的缩小,而群体之间发展能力差距的缩小才是共同富裕的“渔”,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面临的不仅是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问题。政府和学校应革新资助理念,建立完善发展性资助模式,着眼于资助对象的全面发展,通过“发展性项目”和相关的教育、培训服务来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既解决其暂时困难,又为其长远发展负责,实现助困与育人的有机结合。完善政府、高校、社会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就业指导体系,打造学生职业技能学习平台,强化学生实践教育,利用校友资源等丰富就业网络和就业信息,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弥补农村学生和贫困学生的资本和能力短板。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J]. 陕西政报,1954(1):182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24.
- [3]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7.
- [4]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中国民政,2021(20):46.
- [5] 范恒山.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五大着力点[J]. 经济纵横,2020(2):15,137.
- [6] 李修彪,黄乾.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基于CGSS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2020,36(18):4649.
- [7] 彭骏,赵西亮. 教育政策能促进农村教育代际流动吗: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21,37(5):2031.
- [8] 乐志强,尹科. 虎父无犬子吗: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机制分析[J]. 重庆高教研究,2021,9(4):94-104.
- [9] 顾辉.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阶层固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变迁分析[J]. 广东社会科学,2015(5):202-213.
- [10] 高勇. 教育获得、户籍差异与户籍的意蕴[J]. 社会发展研究,2015,2(4):4363,239.
- [11] 范先佐. “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及解决之道[J]. 全球教育展望,2020,49(3):3641.
- [12] 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4-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66(1):44-62.
- [13] 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6):1642-1690.
- [14] 方长春,风笑天. 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义务教育中的阶层差异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08(8):4755,127.
- [15] 王倩. 社会资本和家庭背景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6):6775.
- [16] 阎凤桥,毛丹.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社会资本因素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08(4):5665.
- [17] 吴秋翔,崔盛. 鲤鱼跃龙门:农村学生的大学“逆袭”之路: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1):124-136,170.
- [18]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1986:244-258.
- [19] REAY D. Always knowing and never being sure: familial and institutional habituses and higher education choice[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1998,13(4):519-529.
- [20] 唐可月. 教育在代际流动机制中的作用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的分析[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6):5566.
- [21] 洪岩璧,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2014,29(4):7393,243.
- [22] BLAU D M.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child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81(2):264-276.
- [23] PLUG E, VIJVERBERG W. Does family income matter for schooling outcomes? using adopte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5,115(506):879-906.
- [24] 靳振忠,严斌剑,王亮. 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子女教育期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分析[J]. 教育研究,2019,40(12):107-121.
- [25] 刘波. 高等教育质量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基于CHIP(2013)的实证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1(1):7785.

- [26] DUNCAN G J, MORRIS P A, RODRIGUES C.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 estimating impacts of family income on young children's achievement with data from random-assignment experiment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47(5):1263.
- [27] BUI K V T.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t a four-year universit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reasons for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first-year experiences[J].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2002, 36(1):312.
- [28] REAY D. Shifting class identities?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M]//Vincent C.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2003:5464.
- [29] 赵红霞,冯晓妮.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及地区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 CHARLS 2013 数据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6(8):5458.
- [30] 吴斌珍,赵心妤,钟笑寒.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6,39(2):142166.
- [31] 屈小博,吕佳宁.大学教育质量与劳动力市场表现:基于工资回报的分析[J].经济动态,2020(2):3044.
- [32] 袁振国.教育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N].浙江日报,20241208(04).
- [33] 赵红霞,王乐美.促进还是抑制: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基于 CGSS 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高教探索,2020(9):511.
- [34] 杜媵.谁家的孩子进入了“985”院校:关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纵向研究[J].山东高等教育,2018,6(5):5465.
- [35] 刘泽云,刘佳璇.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元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325.
- [36] 张欣,陈新忠.教育代际累积效应下子代收入的樊篱与跃迁:基于 CGSS 2015 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1,37(5):3238.
- [37] 马道明.输在起点的流动:农村大学生的城市之路[J].中国青年研究,2015(10):5660,65.
- [38] 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17,4(3):127,242.
- [39]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7(6):3865,243..
- [40] 崔凤,张海东.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及其政策选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3):6571.
- [41] 苏叶兰,詹莎.社会阶层流动视阈下的高等教育公平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0(6):207212.
- [42]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244.
- [43] 张顺.70年来中国阶层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J].人民论坛,2019(29):3840.
- [44] 冒荣.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作为公平的正义[J].江苏高教,2021(8):46.
- [45] 吴晓刚.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J].社会,2016,36(3):131.
- [46] 戴思源.大学扩招、重点学校与城乡高等教育不平等(1978—2014)[J].教育与经济,2018(2):1826,61.
- [47] 李伟.关系与“读书无用论”:基于 CGSS2006 和 CGSS2008 调查数据的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6(11):124128.
- [48] 周向伟,张天雪.感知与突围:教育场域中农村家庭的阶层代际流动: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6):18.
- [49] LEWIS O. The culture of poverty[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 215(4):1925.
- [50] 陈小静.大学生加入社团的动机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1:24.
- [51] 张凌.学业成就获得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9,17(1):6467.
- [52] 高耀,刘志民,方鹏.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 20 所高校的调研数据[J].高教探索,2011(1):137143.
- [53] 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J].教育研究,2017,38(3):3437.
- [54] 李春玲,郭亚平.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J].社会学研究,2021,36(2):138159,228229.
- [55] 杨沫,王岩.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3):6076.

- [56] 吴克明, 卢同庆, 王远伟. 城乡高考弃考现象比较研究: 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 33(23): 3945.
- [57] 张锦华, 沈亚芳. 投资风险、选择困境与弱势补偿: 大学生就业难背景下农村家庭的教育意愿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2, 10(1): 24-27.

(编辑: 杨慷慨 校对: 王茂建)

Does the Urban-Rural Gap Narrow the Offspring's Occupational Earnings Differ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ZHANG Bingbing, YAO Congli, NING Yiji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Reasonable and orderly social mobil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the foundation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the occupational earnings of the offspring as a proxy and incorporating urban-rural gap into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alysis framework,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gap on offspring's occupational earnings both overall and chronologically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ustaining urban-rural gap doesn't narrow the occupational income gap of the offspring. Firstly,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has exacerbated the inequality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the growth environment widens the dispa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outcom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result, graduate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face the risk that the absolute income rises intergenerationally but the relative income falls intragenerationally. Finall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narrow the gap in group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Key words: urban-rural gap; offspring's occupational earnings; college quality; common prosperity;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